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84期
2013年7月12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克劳塞维茨与孙子
——二十一世纪的战争范式

[德]安德雷斯·赫伯格－罗思*

“战略信息战”概念和诸如约翰·博伊德（John Boyd）这样的第四代战争的理论家广泛运用孙子的思想来解释和论证他们的观点。一些专家甚至得意洋洋地宣称，孙子已经在战场上打败了克劳塞维茨，因为美军的作战指导依据的是孙子的法则，而伊拉克军队的俄国顾问则依据克劳塞维茨以及俄军在1812年战争中抗击拿破仑大军的经验。这种得意洋洋的态度早已被抛弃。

如同包括约翰·博伊德在内的“战略信息战”和第四代战争理论家这样将《孙子兵法》理解为成功作战工具的人所缺乏的是对于战争之后形势的政治层面的理解。他们过于关注纯军事领域的成功，而低估了将军事成功转化为实质性胜利的进程。将孙子的战略中的三个核心组成要素运用于我们的时代并非易事：对敌手采取全盘欺骗的态度有可能导致对本国民众的欺骗，这对于任何民主国家而言都是成问题的。总体上采取间接战略则会削弱一国对于态度坚决并能果断行动的敌手的威慑力。把重点放在影响敌手的意志和思想上，则只会使其可以回避在不利的时间和地点交战，并在其拥有必要的手段，即武器和兵力的情况下，能够选择更好的时机。

遵循孙子的法则，或许能够赢得战斗甚至战役的胜利，但却很难赢得战争。

---

* 安德雷斯·赫伯格－罗斯（Andreas Herberg-Rothe），博士，德国富尔达应用科学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系常任讲师。曾任洪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国际知名克劳塞维茨研究专家。

期许迅速并且轻易战胜任何敌手的军事革命、新保守主义者塑造世界的欲望，以及对于孙子的部分法则的运用这三者的结合，造就了美军在作战中的成功，但也导致了显而易见的失败。

笔者将通过聚焦孙子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位大师所提供给我们的、用于理解二十一世纪战争的视角和范式，来进一步阐述这些问题。

孙子似乎不太关注于改变政治条件，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内战不断的时代。他唯一的目标是在付出最低代价，并且尽可能避战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因为即使获胜的战役也可能会使己方在迎战下一个敌手的时候变得更加虚弱。然而，孙子的主要问题在于，他忽视了塑造战后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一战略视角及其对战争指导的“庙算”影响。如前所述，这对于孙子及其同时代者而言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却是我们时代的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

最后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孙子的战略在应对他所处时代的一般情况，即对手的武装力量及其相关社会建立在一种非常薄弱的秩序之上，如军阀体系和专制制度之上时，大体上是行之有效的。他的兵法中包含了大量运用简单行动导致对方军队和社会混乱，使之崩溃或者完全丧失战争意志的内容。这种方式在对付军力弱小和社会基础薄弱的敌手时可以取得明显成功，但可能难以对付基础更加牢固的敌手。以色列总参谋部在上一次黎巴嫩战争中对付真主党时便明显出现了这种误算。

对克劳塞维茨的一种新的诠释

以往的研究几乎完全专注于拿破仑所进行的成功的会战对于克劳塞维茨思想的重要影响。笔者希望强调的正好与之相反：除了拿破仑的成功之外，在俄国以及最终在滑铁卢会战的失败中所体现出来的拿破仑战略的局限性，促使克劳塞维茨发展出其关于战争的一般理论。在其专注于战争分析的一生中，克劳塞维茨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同样的战略和法则，虽然决定性地为拿破仑初期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却无法应对俄国会战的特殊环境，并最终导致其在滑铁卢的失败。虽然克劳塞维茨在其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但在晚年，他认识到一种不变的、单一的军事战略的运用所产生的不同的历史结局对于理论的重要意义。最后，他竭尽全力地寻找一种能够包容以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的成功、俄国会战所体现出的武力至上的局限性，以及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最终失败为标志的几个极端战例的解析。相似军事战略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迫使他强调作为终极目标并且决定正确的战略选择的政策与政治的作用。因此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教条地推崇一种单一的战略，而是找到一种结合了不同对立面的正确战略。对于以下

四种在克劳塞维茨早期和晚期的思想中存在的基本矛盾需要进一步加以强调，因为它们在当前关于克劳塞维茨论著的辩论中处于中心地位：

一是军事力量优先还是政治优先；

二是涉及生存的战争，或者说克劳塞维茨早年所最为关注的、影响个人身份认同的战争，还是他晚年论著中强调的从工具视角来审视的战争；

三是追求“摧毁原则”所体现的通过无限制地使用暴力来追求军事胜利，还是优先强调克劳塞维茨晚年所愈发重视的有限战争以及在战争中对暴力的有限使用；

四是优先强调防御作为战争中的一种更强有力的形式，还是强调取得进攻的主动权所体现的产生决定性效果的前景。

克劳塞维茨最终的视角被浓缩在《战争论》第一卷第一章末尾的“三位一体”概念当中。“三位一体”本身及其所涉及的问题是克劳塞维茨的真正遗产和他的理论的真正起点；正如他所强调的：“但无论如何，这里所确定的关于战争的概念(即三位一体，作者注)，在我们看来总还是投到我们的理论的基础上的第一道曙光，它首先为我们区分开大量的现象，使我们能够辨别它们。”

克劳塞维茨关于“三位一体”的阐述是：“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他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战争论》第一章及其末尾的作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成果的“三位一体”，是一种总结这些迥然不同的战争经验，并在拿破仑的成功、其战略的局限性，以及他最终失败的基础上来分析和阐述一种一般性的战争理论的尝试。

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与所谓的“三位一体战争”不同。后一概念并非源自于克劳塞维茨本人，而是来自于哈里·萨默斯(Harry G. Summers, Jr.)的论著。虽然萨默斯在他颇具影响力的关于越南战争的著作中提到了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概念，但他对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理解根本是错误的。在相关段落中，克劳塞维茨对于三位一体的解释是：它一是“主要”和民众相关，二是“主要”和指挥员及其部队相关，三是“主要”和政府相关。基于这三个“主要”，我们并不能将由民众、军队和政府三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战争”等同于克劳塞维茨对其“三位一体”概念的三个重要因素的组成方式的理解。

自从萨默斯强调了这一概念之后，它就不断地被重复，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马丁·范克勒维尔德 (Martin van Creveld)。与此相反的是，必须指出，“三位一体战争”的这三个组成要素只是运用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基本概念的案例。

这些案例在一些历史和政治背景中是有意义的，比如萨默斯所指出的越南战争中美国民众、军队和政府之间所存在的无法逾越的鸿沟的情况。虽然存在运用这些案例的可能性，但毫无疑问，克劳塞维茨对于“三位一体”的定义是不同的，他是在一种更为宽泛、不那么具体且更为概念化的意义上来界定这一概念的。

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概念与他关于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呈分化之势。尽管克劳塞维茨首先在“三位一体”中重复了这一论断，但如同克劳塞维茨之后强调的，如果不希望与现实产生矛盾，这仅仅是必须考虑的三种趋势之一。对于他的模式进行更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他将战争描述为政治的继续，但是以政治之外的其他手段。他这一论点的两个部分包含两个极端：作为政治的继续的战争，和主要属于军事领域的战争。克劳塞维茨强调政策所采取的其他的非政治性手段。这在作为政治的继续的战争，和“其他”手段的显著特征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基于一方考虑来解决这一矛盾往往导致军事优先，同时这种内在的矛盾也在“三位一体”中得到阐述。

在当前关于新战争样式的话语体系中，克劳塞维茨被视为“旧的战争样式”的代表。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他对国家的定义是某种战争共同体（如他本人在谈及“国家政策”时一样），他的“三位一体”是一个关于战争与暴力冲突的一般理论的起点。孙子总结了能够在某些条件下取得成功的针对弱小对手的战略原则，而通过研究拿破仑的战争方式的成功、局限和失败，克劳塞维茨则发展出一种可以广泛运用的关于战争的政治理论。虽然他或许仅仅研究了一种单一的战略，但他能够基于其成败与局限，发展出一种宏观的战争理论，超越了那种纯粹的、有历史局限性的军事战略。克劳塞维茨并不否认战争对于政策的反作用，反之亦然。但他坚持共同体的政策需要决定是否发动战争以及战争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期许轻而易举地取得军事胜利——不管这种期许是来自新保守主义者，还是那些受到第四代、第五代或者不管多少代战争理论家所影响的人，还是那些将孙子本来有用的建议加以绝对化的人。或许人们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在上一个十年中，关于完全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期许已经被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证明是错误的。克劳塞维茨再度回归议程，意味着政治优先时代的回归。

（李晨 译　于铁军 校）

编辑：侯颖丽　审核：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网址：www.c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